

谱牒之争：以十八世纪婺源詹氏为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卜永坚

一、楔子

笔者读明清家谱的序跋时，或多或少做了“迎接沉闷”的心理准备，预计总会碰上满纸“水源木本”、“敬宗收族”之类的套语。不料，刊行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庆源詹氏宗谱》，首篇序言，其深重的危机感和鲜明的战斗姿态，跃然纸上：

吾始祖黄隐公四世长孙云烟公子小八公，自庐源迁筑庆源，世为宗子。唐宋迄今，千有余年。嘉靖统宗谱，五世合编，大宗小宗支干，犁然彙别。万历年间（1573-1620），庐源改造宗谱，颠倒弟兄。国朝雍正乙卯（十三年，1735），又转因袭承讹，中多鱼目，一时不可再问……庐源实为欺祖！……今乾隆辛丑（四十六年，1781），庐源又复邀修统谱，我派孙子素明尊祖大义者，恐族大支繁，夙被所愚之人，仍蹲故辙，爰于壬寅（乾隆四十七年，1782）孟夏，约集远近宗支，开局祖祠，特于嘉靖谱底汇出云烟宗派，厘其支裔……凡四易稿、三更裘……乾隆乙巳（五十年，1785）三月既望，裔孙建邦百拜序。^①

看来，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孰为宗子的纷争，从嘉靖、万历到乾隆，已延续二三百年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进入庐源、庆源詹氏谱牒冲突的细节之前，有必要作简短的学术史回顾。谱牒是彰显地方社会面貌的重要史料，这不仅已经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共识，而且利用谱牒所作出的研究，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例如郑振满利用大量明清时期福建地区谱牒，描述明清时期福建宗族的“继承式”、“依附式”、“合同式”等三种形态，并提出宗族组织与地方社会互动而产生的宗法伦理庶民化、基层社会自治化、财产关系共有化的社会变迁趋势。刘志伟、科大卫（David Faure）亦分别利用广东地区谱牒，探讨明清时期广东的国家—社会关系，其中赋役制度演变、沙田开发、士绅活动等等，无一不涉及宗族制度。^②在王朝统治时间更长、士绅化程度更高的徽州，谱牒作为研究徽州地方历史的重要性，就更加不言而喻。叶显恩利用徽州谱牒探讨明清徽州社会的特殊形态——佃仆制度；^③中岛乐章也利用谱牒及家族文书来探讨休宁县茗州吴氏的发展及其与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④本文研究婺源县两处詹氏在编纂谱牒时的冲突，目的不在判断各支詹氏房

^①詹大衡等纂修《庆源詹氏宗谱》，乾隆五十年（1785）惇叙堂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谱牒室藏，编号914767~77，卷首《詹建邦序言》。按，上海图书馆的这个版本，为“姪字柒号”、由“定派礼房士宜公众”收领的版本，卷首1卷，正文24卷，卷11已佚。从卷首《庆源詹氏各房领谱字号》看来，分别有取自《周礼·地官司徒》“六行”的“孝”、“友”、“睦”、“娵”、“姪”、“恤”六字，每字下编一至十号凡10本，合共60本。

^②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③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④中岛乐章：《明代乡村の紛争と秩序：徽州文书を史料として》第5章《紛争と宗族の展开——休宁县の茗州吴氏をめぐる》，东京：汲古书院2002，第180~213页。

派之间的是非曲直，而是从明清时期徽州的历史脉络中，把握婺源各派詹氏编纂宗谱的过程。换言之，本文利用谱牒来理解历史，也通过历史来理解谱牒。

二、婺源县境内的庐源与庆源

婺源县是明清时期徽州府辖下六县之一，位处徽州府南端。1934年民国政府围剿江西苏区红军期间，为方便行政，将婺源划入江西。此后，婺源返皖的呼声不断，但婺源至今仍隶江西省。^①今天的婺源县，隶属江西省上饶市。本文研究的庐源与庆源，都位于婺源县北部。

“庆源”至今仍存，居民仍以詹姓为主。十七世纪末，出身庆源詹氏的生员詹元相，留下了一部极富社会经济史价值的《畏斋日记》。^②当代出版的《江西省婺源县地名志》，其有关“段莘人民公社”的部分，提及该公社辖12个大队、104个生产队、79个自然村，其中“庆源”就是一个大队，庆源村则是“唐广德间（公元763-764年），邑内庐坑詹姓建村”。^③当代出版的《婺源县志》，亦把庆源登记在段莘人民公社内。^④可以说，庆源村的历史相对完整。然而，庐源却是另一回事。

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庐源属于婺源县北部的浙源乡孝悌里第十三都，由于该志有关“坊都”规划的记载，最晚提及乾隆九年（1744），可见“庐源”最晚在乾隆九年（1744）已经存在。^⑤奇怪的是，这本《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内的地图，是民国年间绘制，不为不详尽精确，^⑥在“北三区舆图”内，浙源乡孝悌里第十三、十四都大部分乡村或重要地点都有标出，但却没有“庐源”。^⑦在《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内，“庐源”见于“坊都”的文字记载，却不见于地图的记载。当代出版的《江西省婺源县地名志》，其有关“浙源人民公社”的部分，提及该公社辖6个大队、66个生产队、62个自然村，并没有“庐源”名目。^⑧之后出版的《婺源县志》，其第一章《建置区划》有关浙源乡部分，基本上沿袭了《江西省婺源县地名志》记载，提及浙源乡所辖62个自然村，也没有“庐源”名目。^⑨可是，近代中国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就是祖籍庐源。这如何解释？笔者没有很好的答案。但是，由于《庆源詹氏宗谱》及《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

^①有关婺源返皖运动的研究，参见唐立宗《省区改划与省籍情结—1934至1945年婺源改隶事件的个案分析》，收入胡春惠、薛化元主编《中国知识分子与近代社会变迁》，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2005年，第519~546页。

^②詹元相：《畏斋日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第184~274页。

^③婺源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婺源县地名志》（江西省地名丛书，第18集），婺源：婺源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第28页。另外，笔者2009年5月23日亦探访过庆源村。

^④婺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婺源县志》，档案出版社，1993，第58页。

^⑤《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3《疆域四》，葛韵芬等修、江峰青纂，民国十四年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6年影印本，第92、95页。

^⑥《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刊载地图时称：“庚申按自治章程，大县不得过十区……而地方习惯，仍分为十七区”，县以下分为“区”，当是民国年间的规划，庚申为民国九年（1920），亦即县志编纂开始之年分，有“民国庚申年”的“重修婺源县志名籍”可证，见《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2《疆域》，卷首《名籍》，第54、4页。

^⑦《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2《疆域》，“北三区舆图”，“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60~61页。

^⑧《婺源县地名志》，第31~37页。

^⑨《婺源县志》，第60页。

都说庆源詹氏来自庐源詹氏（详下文），而据《江西省婺源县地名志》，庆源村是“唐广德间（763-764），邑内庐坑詹姓建村”。^①然则“庐源”是否就是“庐坑”？笔者就此问题请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他指出：婺源方言中，“坑”与“水”同意，因此“庐源”就是“庐坑”。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庐源”定位于清朝婺源县北部十三都境内（参见图1、图2）的“庐坑”。^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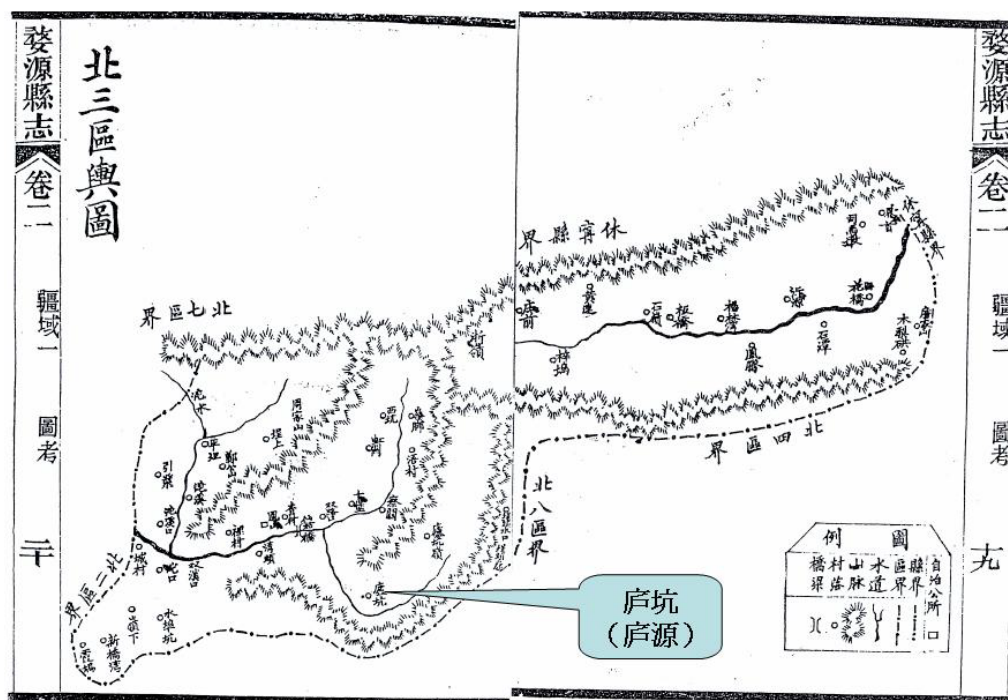


图1 清朝婺源县北部十三都境内的庐源位置推测图

资料来源：《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2《疆域》，“北三区輿图”。（“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60-61页）

^① 《婺源县地名志》，第28页。

^② 詹天佑就是庐源人，见《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24《人物五·宦绩》，“詹天佑”条，“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458页。但詹天佑从他曾祖父那一代开始，就已经定居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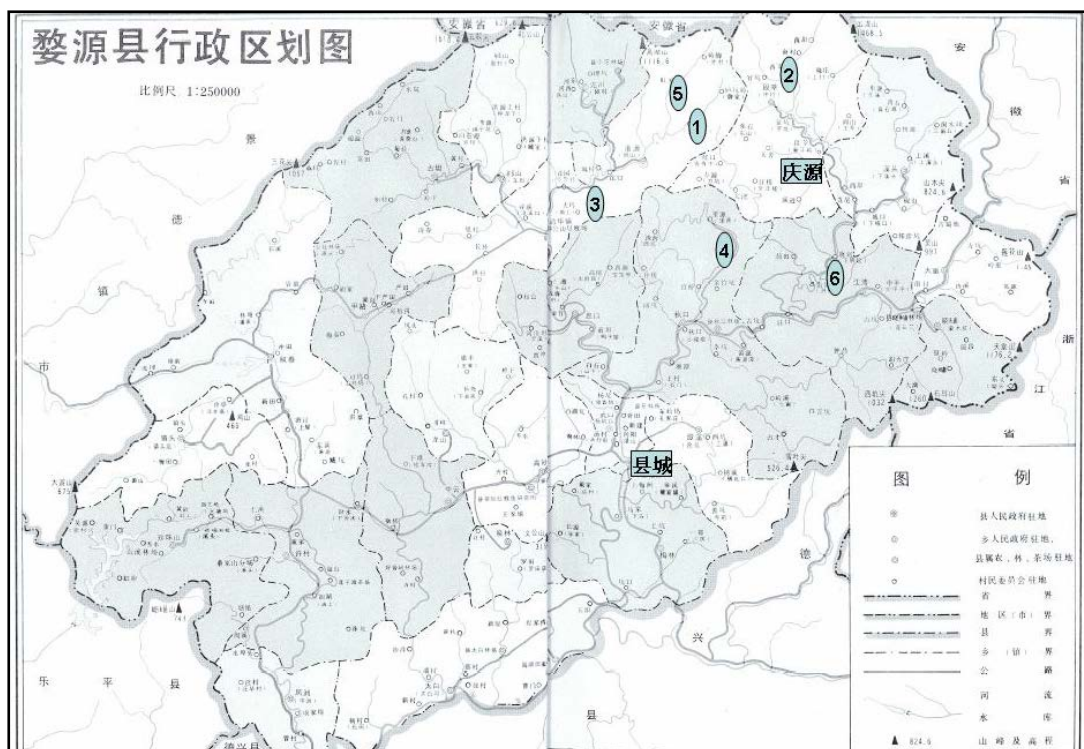


图2 婺源县东北部各派詹氏位置图

资料来源：婺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婺源县志》，档案出版社，1993；《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2《疆域》，“北三区舆图”。（“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第27册”，第53-54页。图中的数目字分别代表：(1)庐源、(2)西安（即西岸）、(3)龙湾（即新桥湾）、(4)秋湖（即秋溪）、(5)察关、(6)桃源，参见《婺源县地名志》第35、25、36、94、69页。这六派詹氏联合编纂《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

婺源地形，素有“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之称，东北部尤其层峦叠嶂。^①同处婺源东北的庐源、庆源两地，相距不远，从地图上计算，直线距离为10公里。本文研究的詹氏谱牒纷争，其地理脉络，大致如此，但是，詹氏谱牒纷争的历史脉络，则复杂得很。

三、《庆源詹氏宗谱》与《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

从本文楔子引述的《庆源詹氏宗谱》詹建邦序言看来，这本宗谱之所以面世于乾隆五十年（1785），是因为庐源詹氏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编纂宗谱，意图延续“改造宗谱，颠倒弟兄”的“欺祖”行为。庆源詹氏觉得不能坐视不理，遂亦于翌年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纂宗谱，以资抗衡。所谓庐源詹氏“改造宗谱，颠倒弟兄”，“欺祖”云云，究竟所指为何，下文将有详尽分析。这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庐源詹氏编纂宗谱，确有其事，但不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而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由“庐源、西安、龙湾、秋湖、察关、桃源等派裔孙”正式刊行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②这六派詹氏都位于婺源县东北部，

^① 《婺源县志》，第6页。

^② 庐源、西安、龙湾、秋湖、察关、桃源等六派詹氏编《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第61种，线装书局，2002），第2册卷末。下文对此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基本上对庆源詹氏形成半包围（参见图2）。^①当然，这场纷争不是军事冲突，而毋宁说是文化战争，因此我们不应用军事地理的思维来判断双方形势之优劣。

如果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庐源詹氏由六派组成，则同期的庆源詹氏又如何？《庆源詹氏宗谱》有三十四世孙詹廷芳序言：“……适宗人某某，弗惮烦剧，蒐葺联谱，予派亦乐从。”^②可见庆源詹氏同样亦不只是庆源一村的詹氏，而同样也是跨越村落的集团，可惜这位詹廷芳属于哪一派，他自己亦未说明。鉴于《庆源詹氏宗谱》提及的支派名称及地名繁多，又不像《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那样在序言中列明支派的地望，而中国县级以上地名相同者实在多不胜数，要仔细辩证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庆源詹氏集团的成员，恐非本文篇幅所能照顾。因此，笔者暂时只能把庆源詹氏集团的成员这个重要问题，一笔带过：从《庆源詹氏宗谱》的目录看来，属于庆源詹氏集团的成员，不在“分迁”之列而确知位于庆源村附近的，至少有：汪溪、胡资田（即胡思田）、大秋岭、溪进。^③总之，只要我们意识到詹氏各派分裂为庐源、庆源两大阵营，就已足够。本文以下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1）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的纷争是什么？（2）为什么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会发生这样的纷争？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即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的纷争是什么，并不困难。笔者根据《庆源詹氏宗谱》、《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绘制了二谱的早期谱系图（见图三、图四），双方的纷争，可谓一目了然。两本宗谱都提及第三世詹伯高生有三子，也都提及第三子为云气公，尽管两本宗谱对于云气公的名字记载不一，但云气公排行第三，并无歧义。歧义最大的，是云烟公詹显和云岳公詹善的排行。在《庆源詹氏宗谱》里，第四世嫡长子是云烟公詹显，也就是庆源詹氏开基祖小八公詹盛的父亲，云岳公詹善排行第二。这样，假如婺源县北部各个詹氏要算成一个宗族的话，则云烟公、小八公父子以下的庆源詹氏，自然就是嫡派宗子。相反，在《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里，第四世嫡长子是云岳公詹善，云烟公詹显排行第二。这样，假如婺源县北部各个詹氏要算成一个宗族的话，则云岳公以下的庐源詹氏，才是嫡派宗子。这时，我们就明白，为何本文楔子引述的《庆源詹氏宗谱》詹建邦序言，谴责庐源詹氏“改造宗谱，颠倒弟兄”，犯“欺祖”之罪。我们也明白，为何詹建邦序言开首就说庆源詹氏“世为宗子”。所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各自宣称是詹氏嫡派宗子。

^① 有关庐源、西安、龙湾、秋湖、察关、桃源的位置及简略介绍，参见《婺源县地名志》第35、25、36、94、69页。

^② 《庆源詹氏宗谱》，卷首《詹廷芳序言》。

^③ 《婺源县地名志》，第28、29、30页。它们和庆源一样，都属于段莘人民公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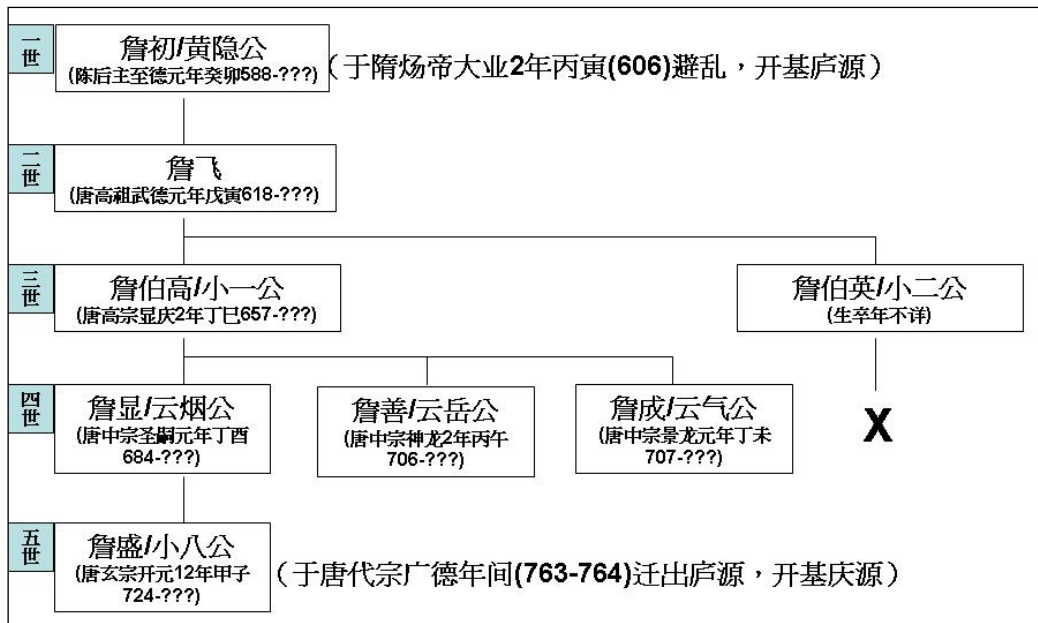


图3 《庆源詹氏宗谱》内的早期谱系

资料来源：《庆源詹氏宗谱》卷1《庐源祖系》，页1b-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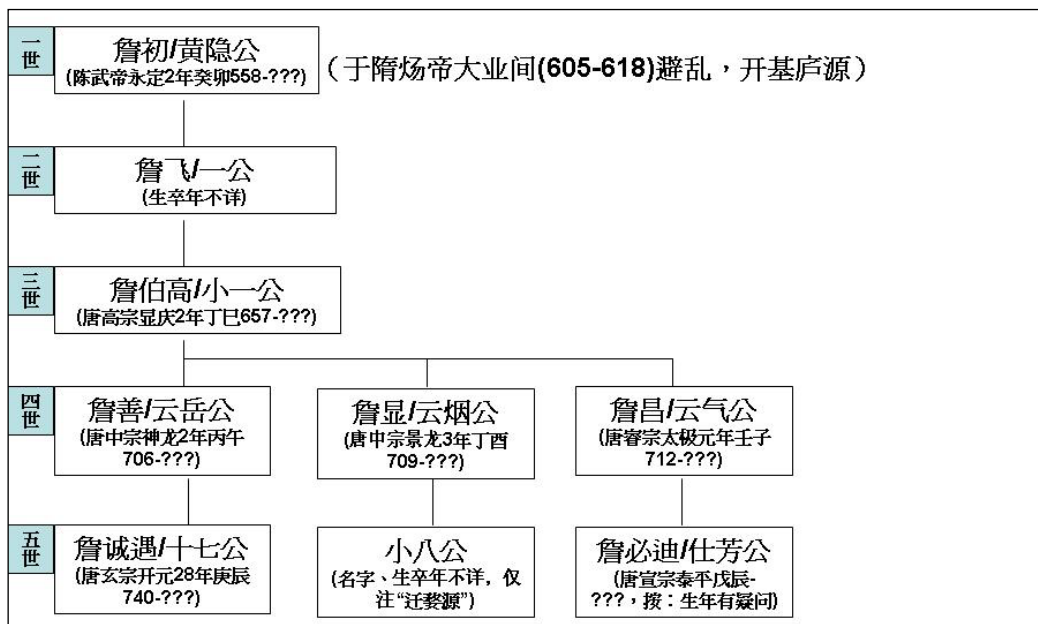


图4 《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内的早期谱系

资料来源：《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1《新安庐源祖系》，页1a-1b。^①

但是，要判断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究竟哪派是宗子，则不容易。不用说，《庆源詹氏宗谱》和《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都引述大量早期谱系的序跋，只是，

^① 据《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原文，第五世詹必迪生于“唐宣宗泰平戊辰”，但查对纪元年表，唐宣宗年号是“大中”，他在位期间的“戊辰”为大中二年(848)，这年，詹必迪父亲已136岁，恐不可能。公元848年以前的第一个戊辰为唐德宗贞元四年戊辰即788年，这年，詹必迪父亲76岁，似亦不无可疑。

收入十八世纪刊刻的、有鲜明立场的谱牒中的早期序跋，不无真假难辨之虞，^①而詹伯高亦非程灵洗这类有正史可稽的人物，要考证他儿子云岳公詹善、云烟公詹显的排行，殊觉无从入手。因此，正如笔者在本文开首所说，本文不打算判断双方的是非曲直，而尝试解答第二个问题即为何会发生这样一场纷争。

回答第二个问题，有很现成的答案：成为宗族的嫡派宗子，就等于占据宗法制度内的最高位置，由此而带来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利益，都是巨大的，因此是值得争夺的。虽然我们对于当时这两派詹氏的历史所知无几，但至少可以推测：成为嫡派宗子的房派，不仅其成员与有荣焉，而且管理宗族、享用宗族公有资源时，自然就名正言顺。日后打起官司，也更加理直气壮。换言之，合法性这种文化资源，能够为房派带来莫大的社会、经济利益，或至少能够提供保护。但是，这个答案只解释了纷争双方的利益动机，未能解释这场纷争的机制与过程。就此而言，最重要的线索，仍然是《庆源詹氏宗谱》詹建邦序言。容许笔者再度抄录其序言：

嘉靖统宗谱，五世合编，大宗小宗支干，犁然彙别。万历间（1573-1620），庐源改造宗谱，颠倒弟兄。国朝雍正乙卯（十三年，1735），又转因袭承讹，中多鱼目，一时不可再问。^②

原来，这场纷争的机制，就是编纂宗谱，建立文本，从而建构自己的合法性。

也许，先做做文抄公，把两本族谱的序跋抄录出来，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刊行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庆源詹氏宗谱》，凡有五篇当时庆源詹氏成员的序跋：詹建邦序、詹大衡序、詹裕基序、詹廷芳序、詹仰谟跋。^③这五篇序跋都写于乾隆五十年（1785），四篇序为行体，是作者自书（至少没有说是作者之外的人书写），跋为以隶写篆的“天发神讎碑”体，足见这五人都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在四篇时人序言之后，才开始刻录前代序言，相当整齐。

可是，《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就显得体例不周，结构混乱，该谱凡五函二十册，不为不多，除中间 18 卷外，另有《卷末》，还有篇幅长达两册的《卷首》。《卷首》第一册凡 97 篇，第一篇为唐元和四年（809）“裔孙敬从、汇芳”序言，之后除各种谱序外，又有各种诗歌（西安四景诗）、记（如《天乐堂记》）、赋（如《詹孝子赋》）、赞（如《梔田文灿公像赞》）、墓志（如《察关远祖墓志》）、敕（如《忠勇祠救命》）等等。到了《卷首》第二册第二篇，才是庐源、西安、龙湾、秋湖、察关、桃源六派詹氏成员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写的序，可是这批成员只自称“余等”，连名字都欠奉。第二册第一篇序言作者、婺源县儒学教谕曹仁风，竟然也没说请他写序的庐源詹姓成员究竟是谁。接着这两篇序言的，是 36 篇文章，也是包括各种传、序、诗歌、名录、户籍记录、坟墓记录等。第二十册卷末，又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由巴东县知县梁巘以“年家眷弟”身份、为“詹泰”这位“吾郡友人”所写的《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後跋》，^④若只看这里，就会得出当今图书馆目录所谓刊行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印象。实际上，根据第二册最后一页“念五公”支派的詹华盛、詹锡贵、詹锡荣、詹锡德四人于乾隆五十六年

^①例如，《庆源詹氏宗谱》就引述十六世纪初徽州著名文人洪垣嘉靖己酉（二十八年，1549）的《新安詹氏统宗世谱序》，谓：“……是庆源於黄隐以下，固宗子也”，见《庆源詹氏宗谱》，卷首，页 9b。可惜，洪垣并无文集传世。

^②《庆源詹氏宗谱》，卷首《詹建邦序言》。

^③以上四序见《庆源詹氏宗谱》卷首，跋载《庆源詹氏宗谱》最后一页。

^④《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第 20 册卷末。

(1791)的序言,而抄写此序言的是“婺邑莘源汪均木”,字体甚为拙朴,谓编纂宗谱工作早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就开始,当时,“庐源大开谱局,邀集我宗支”,可惜,“奈年深日久,世数难以考究,更加支丁渐衰,又值时势艰难,贫乏者多,无可措办捐资敷费”,由于这重重困难,所以终于等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才正式刊行。^①以上把《庆源詹氏宗谱》、《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比较一下,无论从编辑体例还是序跋内容来看,庆源詹氏的文化水平都高于庐源詹氏。

两派詹氏成员的文化水平高低不是本文关心的问题。正如前述,本文关心的是两派詹氏成员的谱牒纷争的机制与过程。本文认为,这场纷争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而转折点则出现于明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20)、及清雍正十三年(1735)三个时期。

据《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首的《詹氏历世修谱名录》,就明嘉靖时期而言,庆源的詹伯相编纂《本宗谱》,庐源的詹时珍、詹时敬编纂《本源录》,两件事都发生于嘉靖戊申(二十七年,1548)。^②如今这两本谱牒均已不存。本来,编纂刊行谱牒的年份,似乎没什么文章可做。但庐源及庆源詹氏分别刊刻谱牒的嘉靖二十七年(1548),距离《新安名族志》的刊行,仅早了三年。面世于嘉靖三十年(1551)的《新安名族志》,^③对于十六世纪及之后的徽州地方社会秩序建构而言,是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程尚宽于嘉靖三十年(1551)为该书所写的“引”指出,该书由十六世纪徽州文化精英如郑佐、洪垣等发起,由戴廷明等“勤勤蒐辑,垂十年矣”。^④这意味着,《新安名族志》编纂一事,徽州各处风闻已久,也等于掀起了徽州地区编纂谱牒的首次高潮。庐源及庆源詹氏分别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行的谱牒,可说是《新安名族志》“文化工程”这个独特历史脉络中的产物。

《新安名族志》是对于徽州地区著名宗族的全面普查与登记。其编纂、筛选过程当然也受到当时徽州地方社会各种权力关系的影响,但由于此书性质上不是一姓一村的私谱,所以其“客观公正”的程度,仍然较高。《新安名族志》提及婺源县詹氏,凡三派,庐源詹氏“(黄隐)传四世曰善(即詹善),仕唐……五世为诚遇”,庆源詹氏则“唐有讳盛者(即詹盛)始迁于此(庆源)”,秋湖詹氏则“出云岳公(即詹善)之后”。^⑤这样看来,刊行于嘉靖三十年(1551)的《新安名族志》,把庐源詹氏与秋湖詹氏视为同宗,且把詹善视为庐源詹氏的宗子。对于庆源詹氏,《新安名族志》的记载相当暧昧,没说詹盛与詹善有何关系。如果严格按照字面意思考究,我们甚至可以说,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有无宗亲关系,都成疑问。何况,《新安名族志》后出于庆源詹伯相编纂的《本宗谱》及庐源詹时珍、詹时敬编纂的《本源录》,而《新安名族志》编纂者必然无法仔细调查,只能抄录现存谱牒或访问当时在世的各族绅耆,则就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的

^① 《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第2册卷末。

^② 《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首“詹氏历世修谱名录”,页2a(页码不连贯)。

^③ 戴廷明、程尚宽等编,朱万曙等点校《新安名族志》(嘉靖三十年[1551]刊,黄山书社,2004)。按:有关该书的作者、编纂刊印过程、版本等问题,甚为复杂,朱万曙经辨证考订后,认为元代陈栎编纂了《新安大族志》,但未予刊刻,十六世纪初,郑佐、洪垣才将之刊刻。戴廷明等人在这书基础上,费时十年,采辑编纂,成《新安名族志》,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刊行,程尚宽增补大量内容后,于翌年即嘉靖三十年(1551)刊行。见朱万曙,《整理前言》,《新安名族志》,第1~9页。

^④ 《新安名族志》,第14页。

^⑤ 《新安名族志》,页282~283《庐源》,页283~284《庆源》,页284~285《秋湖》。

纷争而言，《新安名族志》的这种记载，显然是不利庆源詹氏的。难怪《庆源詹氏宗谱》的詹建邦序言提及嘉靖年间的谱牒编纂时，语焉不详，只说“嘉靖统宗谱，大宗小宗支干，犁然彙别”，始终没说谁是大宗谁是小宗。

但是，詹建邦紧接着说：“万历间，庐源改造宗谱，颠倒弟兄。国朝雍正乙卯（1735），又转因袭承讹”，这应该是指庐源詹文元、詹文中二人于万历乙酉（十三年，1585）编纂宗谱，及雍正十三年（1735）庐源詹一斌等五人编纂宗谱两件事。^①但是，嘉靖三十年（1551）刊行的《新安名族志》，已承认庐源詹善为黄隐公的第四世孙，则庐源詹氏为嫡派宗子，似已成立。庐源詹氏似无必要“改造宗谱，颠倒弟兄”。

更加可能的情况应该是，拜历时十年的《新安名族志》文化工程所赐，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都开始编纂宗谱，并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即《新安名族志》面世前三年推出各自的宗谱，各自宣称是婺源詹氏的嫡派宗子。嘉靖三十年，《新安名族志》面世，其有关婺源县詹氏的记载，是有利庐源詹氏、不利庆源詹氏的。虽然如此，庆源詹氏已建构了自己为婺源县詹氏嫡派宗子的主张和文本，当然没有轻易放弃或认错之理。于是，约三十年之后，庐源詹文元、詹文中二人于万历十三年（1585）编纂宗谱，自然要驳斥“庆源詹氏为婺源县詹氏嫡派宗子”这种说法，强调庐源詹氏才是婺源县詹氏的嫡派宗子。庐源詹氏的这种反击，自然在庆源詹建邦的笔下就成了“改造宗谱，颠倒弟兄”的“欺祖”行为。此后，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继续“各自表述”，各自强调自己才是婺源县詹氏的嫡派宗子。雍正十三年（1735）庐源詹氏重编宗谱，在庆源詹建邦笔下，自然是“又转因袭承讹，中多鱼目，一时不可再问”。到了乾隆四十九、五十年间，庐源詹氏、庆源詹氏又展开新一轮的族谱编纂竞赛，于是有《庆源詹氏宗谱》、《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之作。

四、总结

《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收录了庐源詹氏集团成员詹永宁万历十六年（1588）的“审异致同谱序”，其中几句，把类似本文处理的谱牒纷争的情形，描写得入木三分：

历世远而支派蕃，中有显耀者弗式其梓里，微弱者率忘其本宗，由是以疑传疑，以讹传讹，自迁徙而诳误门地，由变故而诳误迁徙，出继入继，改姓附姓，踵弊多端，尤难测识。间有阴行己私而文饰焉者。^②

笔者反复强调，本文重点，不是判断庐源詹氏和庆源詹氏孰为詹氏嫡派宗子，而是理解这场纷争的过程与机制。本文把这场纷争追溯至十六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新安名族志》编纂及刊行期间，嘉靖二十七年（1548），庐源詹氏和庆源詹氏都编纂自己的宗谱，都宣称自己是詹氏嫡派宗子。其后，万历十三年（1585）、雍正十三年（1735），庐源詹氏重编宗谱，继续驳斥庆源詹氏，而强调自己才是嫡派宗子。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庐源詹氏再编宗谱，庆源詹氏亦于翌年开始编纂宗谱。于是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之编纂（实际刊行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及乾隆五十年（1785）《庆源詹氏宗谱》之刊行。这样算来，这场有关嫡派宗子的纷争，其纷争过程长达二、三百年，其纷争机制则是编纂宗族谱牒，以文本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当然，文本的建

^① 《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首《詹氏历世修谱名录》，页2a~2b（页码不连贯）。

^② 詹永宁：“审异致同谱序”，万历戊子（1588），载《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卷首，页1b（页码不连贯）。詹永宁为秋湖廿八世成员。

立或曰谱牒的刊行，是能够巩固宗族势力的，但是，能够建立文本、刊行谱牒，这本身就是宗族集团力量的结果。究竟庐源詹氏与庆源詹氏的内部权力结构、经济基础等是怎么一回事？双方除了竞相编纂宗谱打笔战之外，会不会还曾经相互诉讼、械斗等等，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这两派詹氏的谱牒纷争，表面上是争论谁是嫡派宗子。但对于徽州历史稍有涉猎者，都知道明清时期徽州的大姓小姓矛盾，非常普遍，曾不因雍正年间开豁世仆的圣旨而有所缓解，^①则庐源詹氏、庆源詹氏争做嫡派宗子，是否也是大姓小姓矛盾的一种表现？这个可能性，我们不能排除。但是，笔者浏览《庆源詹氏宗谱》、《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所见，发现双方并没有说谁是小姓，只是互相指责对方“欺祖”、“颠倒弟兄”、“阴行己私”等等。不过，嫡派宗子的角色，顾名思义，只能由一派承担，则落败者自然就低人一等，即使短期内没有沦为小姓、世仆的危险，长远而言，这种危险却是存在的。正因此之故，徽州各处宗族都孜孜以宗法伦理的正统性为念。《庆源詹氏宗谱》和《新安庐源詹氏合修宗谱》序言中反映出来的危机感与战斗姿态，也正是十八世纪徽州地区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

（原载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0—343页。）

^① 有关徽州大小姓矛盾及清雍正年间开豁世仆圣旨被徽州地方政府扭曲、架空的情况，参见陈柯云《雍正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实施的个案分析》，《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第116~150页；近期研究，参见拙作《从“葬实仆真”到“一体开豁”——以徽州婺源余姓〈钦定例案〉为中心》，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4辑，法律出版社，2010，第287~309页。